

《四库辑本别集拾遗》后记

杨殿珣

《四库辑本别集拾遗》，栾贵明辑，1983年10月中华书局出版。这是根据现存《永乐大典》残本，校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四库珍本丛书初集》，和其他版本四库辑本别集中辑自《永乐大典》者，经校录后，发现四库大典本及各家校辑本漏辑1864条，因而将漏辑各条，编为本书，共补辑了别集158种，还有附录两种。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清廷成立了《四库全书》馆，安徽学政朱筠奏请从《永乐大典》辑出佚书，以备著录，其奏中略谓：“臣在翰林，常翻阅前明《永乐大典》，其书编次少伦，或分割诸书以从其类，然古书之全而世不恒觐者，辄具在焉。臣请勅择取其中古书若干部，分别缮写，各自为书，以备著录，书亡复存，艺林幸甚”。清廷同意了朱筠的意见，于是派王际华、裘曰修等从事这个工作，据《四库全书总目》子部、类书类存目，永乐大典提要谓辑出经部六十六种，史部四十一种，子部一百三种，集部一百七十五种，四库总目称为永乐大典本。

这些辑本，绝大多数是已佚的书，已佚之书，又得流传，这当然是件好事，但这些辑本是否忠实可靠呢？根据乾隆四十年（1775年）四月十七日、和四十六年（1781）十一月初六日的谕旨，诗文集中的青词，以及词意嫖狎，有乖雅正的诗词，都被删去了，除此之外，是否还有漏辑的呢？由于《永乐大典》原书是藏之中秘，外人是没有办法去覆核的。

北平图书馆自成立之后，对于《永乐大典》的搜辑，不遗余力，在1929年出版的馆刊二卷二、三号曾编印《永乐大典》专号，公布了《馆藏永乐大典卷目表》，在1933年出版的馆刊七卷五号，刊登了袁同礼先生的《四库全书中永乐大典辑本之缺点》一文，其中略谓：“北平图书馆现就国内外现存之大典，为辑佚工作，仅就现存残帙而言，发现馆臣之遗漏失辑之处，不一而足，如王质《雪山集》，赵鼎臣《竹隐畸士集》，舒岳祥《阆风集》，张侃《拙轩集》，其遗文见于大典者尚多。”可是北京图书馆的辑本，未见印行，详情不得而知，但却确实提出了四库馆臣所辑本遗漏失辑者是颇多的。

自从中华书局在庆祝国庆十周年之际，将现存《永乐大典》影印出版后，《永乐大典》得以广为流传，不再像以往那样珍秘难求了，这给辑补工作者许多方便。栾贵明同志就是根据中华的影印本七百三十卷和该局陆续搜集到的六十五卷，以及北京图书馆又新从山东掖县搜集到的二卷，对于四库辑本别集作了补辑工作。根据所见别集版本，分为三部分，一为《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所收四库辑本别集二十八种拾遗，另附一种；二为《四库珍本丛书初集》所收四库辑本别集六十一一种拾遗，另附一种；三为其他版本四库辑本别集六十九种拾遗，其中包括一种，虽未收入四库，但也是馆臣所辑的。

栾贵明同志的辑佚工作，作的很细致，体例很周密，在每书的补辑之前，略述作者简历，次把《永乐大典》所引的书名，凡有岐异的都一一列举出来，每种书名之下，注明现存《永乐大典》各卷收录了若干条，共若干条，馆臣漏辑者若干条。在本条辑文之后，注明见《永乐大典》的卷数，某字韵，在某页的上或下，最后注名见影印本的第几册。所以读者如需核对原书，这是很方便的。

兹以董嗣杲《庐山集》《英溪集》为例，以见一般。现存

《永乐大典》录：

靖传翁百花诗 一条

董思学诗 一条

董思学靖传翁百花诗 一条

董思学靖传翁百花诗集 一条

董嗣杲诗 三条

董嗣杲庐山集 四十七条

董嗣杲英溪集 十二条

仪真志引 一条

以上共六十七条，馆臣漏辑三十四条。

因为董嗣杲号靖传，后来隐居黄冠，改名思学，所以永乐大典所引，有许多不同的名字，这样辑佚工作者必需以很细心的态度对待，才不致有所漏辑，这也可以说明栾贵明同志的工作认真和仔细。

栾贵明同志在本书序中说：“现存《永乐大典》引录这些别集和附录共六千四百九十五条，经核校后，发现四库‘大典本’及各家补辑本共漏辑一千八百六十四条。条数漏辑率达百分之二十八点八。其中没有发现漏辑的仅八种，共补辑了别集一百五十八种，附录两种。种数漏辑率竟达百分之九十五”。由此可见四库馆臣辑佚工作的草率敷衍，也可说明这部《四库辑本别集拾遗》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

但本书在说明和种数计算上，也有不无疏失之处：

一、在序文中说：“《四库全书》内收大典本别集共一百六十五种。……其中收入《四库珍本丛书初集》者六十五种，……没有发现漏辑的仅八种。”对于没发现漏辑的八种，在注九内有说明，“这八种别集是：家铉翁《则堂集》、陈元晋《渔墅类稿》、卫博《定庵类稿》、廖刚《高峰集》（以上《四库珍本丛书初集》）。查《四库全书总目》别集类十二著录，《高峰文集》

十二卷，为两淮马裕家藏本，并非永乐大典本，据《提要》谓：“其集久无刻本，传写多误，脱字或至数行，无从校补。”说明四库著录本是一个钞本。那末《高峰文集》一种，不应计算在‘大典本’之内，《四库全书》内收大典本别集一百六十五种，应更正为一百六十四种，其中收入珍本丛书初集者六十五种，应更正为六十四种，没有发现漏辑的仅八种，八种应改正为七种。

二、在《四库珍本丛书初集》所收四库辑本别集六十一种拾遗的说明中说(本书第一五九页)“其中收别集一〇五种，辑自永乐大典者六十五种，”六十五种也应改正为六十四种。在说明中又说：“《四库珍本丛书初集》，一九三四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据北京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影印。”按：北京图书馆所藏《四库全书》为文津阁本，辑者也曾经利用文津阁本作过校订工作，如本书八二三页龚敦《鹅湖集》条：现存《永乐大典》录：龚敦鹅湖集一条，……以上共十四条，校《四库全书》文津阁本(藏北京图书馆)《鹅湖集》六卷，馆臣漏辑者一条”，又在谢肃《密庵集》条(本书八一二页)也有“校《四库全书》本(藏北京图书馆)《密庵集》八卷的记载，都说明辑者确知北京图书馆所藏为文津阁本而非文渊阁本，不知在说明里何以有此笔误？

三、在每书的说明内，也有的不很确切，如本书六〇五页王安中《初寮集》的说明为“王安中字履道，中山阳曲(山西)人。”阳曲为曲阳之误，由于误曲阳为阳曲，所以河北的曲阳，变为山西的阳曲了。

六一二页许景衡《横塘集》的说明为：“许景衡字少伊，温州瑞安(福建)人。”这是误以浙江的瑞安误注为福建了。

六一六页洪芻《老圃集》说明为：“洪芻字驹父，南昌(湖南)人。”这条的错误和上条同样，也许是由于校勘时的一时疏失罢？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图书馆